

近代广州教育轨辙

广州近代史博物馆编

學
級甲班修業
績列第叁名
狀以示獎勵此狀
合給本

長廖奉靈
任梁慕蘭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

六月二十三日

广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广州教育轨辙/广州近代史博物馆编. —广州: 广州出版社, 2007.9

ISBN 978-7-80731-612-1

I. 近… II. 广… III. 教育史-史料-广州市-近代 IV. G527.6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38421号

书 名 近代广州教育轨辙

出版发行 广州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天润路87号9楼、10楼 邮政编码: 510635

网址: <http://www.gzcbs.com.cn>

责任编辑 老嘉琪 李筱敏

责任校对 蚁燕娟

装帧设计 刘颖颖

印 刷 广州市岭美彩印有限公司

地址: 广州市花地大道南海南工商贸易区A幢 邮政编码: 510385

开 本 889毫米 × 1194毫米 16开

印 张 16

版 次 2008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12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80731-612-1

定 价 98.00元

近代广州教育轨辙

广州近代史博物馆编

广州出版社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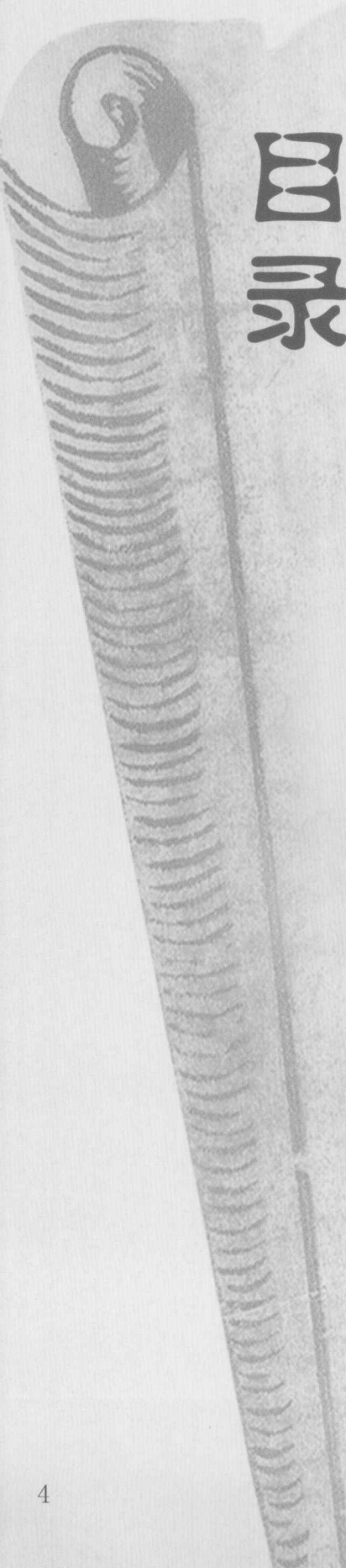
广州是个具有22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但它的绚烂多姿似乎在近代表现得最为彻底。近代广州在经济上是全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文化上兼容中西、求新求变，形成鲜明的地方特色，涌现出了许多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有影响的著名人物。更为重要的是，广州一反过去在历史风云中的相对沉寂状态，多次成为了国内政治运动的中心或策源地：1839年林则徐虎门销烟，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古老的中华帝国从此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广东花县人洪秀全自创“拜上帝会”，在其后的十多年间，洪秀全及其追随者们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中国史上历时最长，涉及范围最广、最彻底的农民革命；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民主革命党人以广州为根据地，发起了诸如黄花岗起义、第二次护法运动等震惊全国的革命运动；1924—1927年大革命期间，广州更成为全国国民革命的中心：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实现、广东革命政府的成立、黄埔军校的创建……许多轰轰烈烈的大事在广州发生。正如中国著名学者葛剑雄教授所指出的，“广州人文资源中，最有价值的是与近现代革命有关的部分，特别是与孙中山、国民革命、国共合作有关的部分，这是别的城市无法替代的，对历史、对海内外、对未来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力。”作为两次鸦片战争的发生地，中国近现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国民革命的中心地，广州拥有丰富的近代史迹资源。

这些资源不仅是广州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最好的见证，也是广州城市文化个性和传统价值的具体体现。广州形象的塑造离不开在这座城市的土地上生活过的人、发生过的事以及人们关于这些人和事的历史记忆和历史态度，离不开其拥有的独特历史文化内涵，离不开长期积淀起来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些不仅是世代居住在此的人们的集体记忆和精神纽带，也构成我们今天生活的重要背景；不仅可以强化市民的乡土意识和民族自豪感，而且也是创造广州新文化的渊源和基础；不仅能起到增添城市色彩和魅力的作用，而且能起到促进城市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这是城市的灵魂，是羊城的历史文化底蕴。

为宣传和展示近代广州，广州近代史博物馆于1999年制作了首个近代广州专题陈列；2003年，编写和出版《近代广州》图册，采用专题的形式精心挑选和辑录了600多幅历史图片和文物照片，获得2003年度广州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三等奖。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深刻体会到：要想全景式地描述近代广州是一件系统而复杂的工程。广州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兼容并蓄，海纳百川，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中西交融的文化。广州之美，它的辉煌、它的特色、它的风情，是散布在建筑、商业等各个方面，渗透在民风、民俗、民情和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这，也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目标。我们将坚定地以广州为立足点，以中国乃至世界为参照物，以教育、商业、医学、城建等专题为切入角度，比较全面地梳理广州近代史的脉络，勾画百年来广州社会经济变迁的历史长卷；我们计划用五到十年的时间，以展览为中心，带动征集、研究、宣传、出版工作，系统集中地去发掘广州，解读广州，寻找隐藏在历史景观背后的城市精神和影像，让更多的人认识广州灿烂的历史文化。

历史文脉是一个城市形成、变化和演进的轨迹和印痕，是一个城市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和生生不息的象征。相较于近代史迹资源的丰富，其宣传、展示、开发和利用工作却远不成比例。我们希望能以此为契机，结合学术界、出版界、传媒界、文博界、收藏界以及所有热爱广州的人们力量，激发起人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和建设文化强市的热情，一起烹制好这道丰富的文化大餐，使近代广州系列展览成为广州这个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一张亮丽的名片。

广州近代史博物馆
2008年12月



目录

序

绪 论 晚清民国时期广州教育的转型	6
-------------------	---

前 言	16
-----	----

第一章 书院新气象——近代兴学的前奏	18
--------------------	----

科举制度的演变	21
书院与教育名流	40

第二章 引进来 走出去——近代教育的发轫	54
----------------------	----

教会学校的创办	56
自办学堂的兴起	72
留学欧美	78

第三章 应时而兴的制度——近代教育体制的确立	86
------------------------	----

废科举与立新制	89
民国初年的教育改革	108
壬戌学制的制定和施行	118

第四章 学出多门——近代教育体系的形成	130
新型的军事教育	133
社会教育的广泛推行	142
中小学教育日益普及	150
蓬勃兴起的职业教育	165
多元化、综合化的高等教育	171
结束语	196
附录一 广州近代教育大事记	198
附录二 近代教育论文选编	218
广东书院制度沿革【节选】	219
十年来广东教育之回顾	225
论中国新学制草案	237
论吾粤实业与实业教育	239
广州市小学调查报告	241
后 记	251

晚清民国时期广州教育的转型

袁 征

广州位于东南沿海。在古代，中国文化主要是独立发展的。南岭山脉横贯东西，阻碍了广东与中原的交流，因而广东文化长期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到近现代，各国文化频繁交流，西方文化对中国的改革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作为中外文化交流主要口岸的广州，就在中国文化教育的近代化中处于领先地位。从晚清到民国，广州教育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新旧交替中晚清的广州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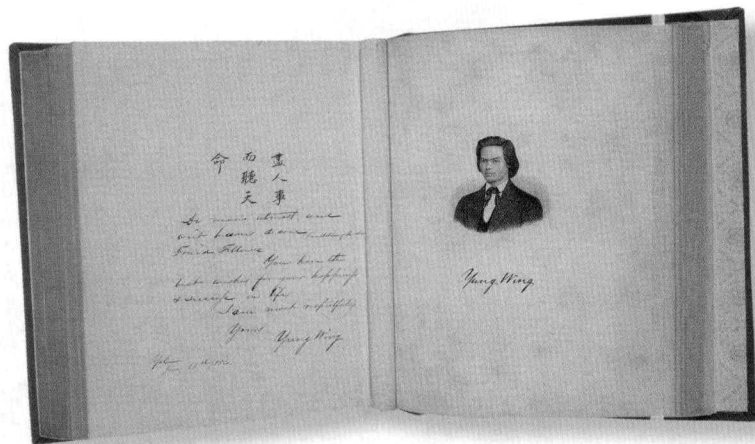
晚清的广州教育，呈现出一派新旧交替的景象。旧式的科举制度依然存在，官学和书院比比皆是。同时，由教会和国人所办的新式学校也在不断涌现。

科举和官学，是清代教育制度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科举是一种考试制度，主要为了选拔政府官员。官学则为科举考试培养和储备人才。在科举引导之下的官学，不过是准备应科举试的机构而已。科举考试内容以八股文为主，文章格式按八个部分组成：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股文的题目出自儒家经典，必须以政府选定的注解作为写作标准。八股文不但要重复统治者颁布的正统观点，而且要严格遵照政府规定的死板格式，是一种病态的文体。为博取功名和官职，科举考生要参加从县试到朝考十轮共二三十场考试。地点有的在县城，有的在府治、省会，有的在京师。以乡试为例，这轮考试有三场，每场三天两夜，三场共九天六夜，考生被锁在大约长四尺、宽三尺、高六尺的小房间里。这些小房当时叫“号室”，考生答题、吃饭和睡觉都在其中，烈日熏蒸，蚊虫叮咬，苦不堪言。乡试一般在秋天举行，天气很热。靠着厨房的号室叫“火号”，这个号室里的考生一天又一天地挨烤。靠着厕所的号室叫“臭号”，这个号室里的考生一天又一天地挨熏。科举考试本身就是逼迫考生屈服的煎熬。清代广州设有乡试考场，称为贡院，所在地位于今文明路鲁迅纪念馆。

依附于科举考试的官学，有国子监和府学、州学、县学等。国子监是清代国家教育的最高学府，而各府、州、县也设有官学，相应称为府学、州学、县学，所在地叫做学宫。过去广州有三大学宫：广府学宫、番禺学宫和南海学宫。如今存留下来的只有番禺学宫。地方官学的学生分为廪膳生、增广生和附生。初入学之生员为附学生员，廪膳生和增广生有定额，以入学后以岁、科两考成绩高者补充。晚清社会腐败，同全国各地的情况一样，广州的官学早已不教学，学生根本不上课，只要每三年参加两次考试（“岁试”和“科试”），乏善可陈。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广州的书院教育，它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特别的地位。广州的书院最早出现在宋朝。清代广州的书院虽有私立的，但著名的书院多为官办。雍正十一年（1733），清朝开始建立由省、府和州县书院组成的全国性官办书院系统。朝廷规定书院讲授八股文等为科举做准备的课程，因而正统的官办书院和府学、州学、县学一样是为科举服务的教育机构。经朝廷批准的广东省级书院是位于广州的粤秀书院和位于两广总督府所在地肇庆的端溪书院。但晚清广东地位最高的却是热心文教的地方官另外开办的学海堂、菊坡精舍和应元书院这三大书院。“学海堂”由两广总督阮元在道光四年（1824）创办。它摒弃八股，不重科举，致力钻研经史，成为全国经史教学和研究的重镇。清同治六年（1867），两广盐运使方睿颐与中丞蒋香泉创办了菊坡精舍，从粤秀、越华和羊城三所著名书院就读过的学生中选拔人才，在菊坡精舍深造培养。应元书院则是在同治八年（1869）由广东布政使王凯泰兴办的，只有举人才能入读书院，兴办书院的目的是为了培养高水平的科举考生。地位稍低的是粤秀、越华、羊城、禺山和西湖五个著名书院，亦为官办，须秀才方能入读，培养目标是参加乡试考举人，学的是四书五经和八股文。从清代中后期起，以广州府衙为中心，在大约方圆一公里之内聚集了学海堂、菊坡精舍、应元书院、粤秀书院、越华书院、羊城书院、禺山书院和西湖书院等重要书院，加上大马站、小马站和流水井一带的书院群，形成了一个书院文化区。

由于广州是中外交流的重要口岸，教会教育在鸦片战争前夕便已经在广州出现，最初是为了吸引中国人信教，后来又成为传播西方科技文化的工具。教会教育的出现，拉开了广州教育近代化的序幕。1834年，侨居广州的外国人成立了“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但由于这个组织的经费和人员不足，实际所做的工作不太多。1836年9月，广州的传教士设立了“马礼逊教育会”，并于1839年11月在澳门开办了马礼逊学堂，由布朗牧师负责管理。1842年，该校迁到香港并加以扩充，学生人数增至40人。马礼逊学堂历时十年，是西方向中国传播西学的第一所洋学堂，后因师资缺乏和经费困难，于1849年停办。当时在广州府内开办的重要教会学校除了马礼逊学堂外，还有其他几所。但初期西方基督教会在广州所办教育，只有小学和中等学校，并没有大学。教会学校的学生毕业后若要继续深造，必须远渡重洋留学外国。19世纪80年代，美国国内掀起了一股向海外宣教的热潮，招募大学生到海外去传教。1884年，广州长老会牧师香便文（B.C.Herry）希望以高等教育传播基督教，提议美国宣教会在广州建立大学，随即在纽约筹款。1888年，格致书院创办于沙基，后来一度停办。1899年，美国牧师尹士嘉来广州重新开办，校址设在四牌楼的福音堂。1900年，格致书院迁往澳门，并改名为岭南学堂。1904年，岭南学堂由澳门迁回广州河南康乐村。1916年，岭南学堂正式更名为岭南大学。岭南大学是广州的第一所大学，开了广州现代高等教育的先河。它把一系列西方的新学科介绍到中国，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促进了中国科学的发展和科技人才的训练。



教会学校在近代中国留学史上也起了重要作用。1846年,主持马礼逊学堂的美国传教士回国,顺道携容闳、黄胜和黄宽三名学生赴美继续学业,这是清末最早的一批留学生。在求学过程中,黄胜因病退学回国。容闳于1854年从耶鲁大学毕业,是首位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中国留学生。黄宽则于1875年获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硕士学位,为中国近代第一位西医硕士。容闳之所以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不仅仅因为他最先涉足美国大学,而且还因为他带动了一个留学西方的浪潮。1872年8月,在容闳的积极倡导下,清政府在1872年至1875年间,先后选派四批共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其中来自广州的有23人之多。中日甲午战争前,中国的留学运动尚未达到高峰,但已有不少广州人开始以自费的方式到外国留学。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朝野上下极为震撼。在思索日本强大的原因后,中国人将其视为学习和赶超的最合适对象。再加上清政府实施的一系列鼓励留学的政策,负笈东瀛便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留学主流。1902年6月,两广总督陶模派吴敬恒带领20余名官费生赴日本留学,开广东省自行出资派遣留学生的先河。1905年废科举后,读经做官之路断绝,广州出国留学的人数大大增加,其中以留学日本为最多,掀起了一股留日热潮。除官费留日外,广州自费留日的人也不少。留日热潮在1906年达到高峰,1910年开始回落。留日学生归国后多身居要津,成为改造中国的新生力量。另外,广州有留美的传统,长期以来陆续有人以自费的方式或在留美“游学会”的帮助下赴美。1905年,清政府开始恢复派遣官费留美学生。1908年,美国决定退回部分庚子赔款,用于培养中国留学生。通过三次全国考试,中国选拔出183人赴美留学,其中广州约有20多人。此外,庚款留英、德、法等国的官学生也陆续派出,广州学生在其中占了较大的比例。留学欧美的热潮以后还有进一步的发展。频繁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使广州居民的思想比较开放,因而广州在中国近代留学教育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广州也出现了一批国人自办的新式学校。在这些新式学校当中,官办的洋务学堂居于主导地位。由于中外交涉日益增多,清政府为了培养通晓外语的高级文职人员,在1864年6月建成广州同文馆。广州同文馆一开始就模仿西方近代学校制度,以后日趋完善。这所学校当时颇受清政府的重视,内部管理也比较严格,其教学中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与社会挂钩,注重学用结合。广州同文馆是广州最早的新式外语学校,对广州的社会发展曾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1881年,两广总督张树声在广州黄埔长洲岛兴办广东实学馆。广东实学馆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也仿效西方近代学校,与中国传统教育有很大的不同。1884年,后任两广总督张之洞将其改名为广东博学馆,又在博学馆的基础上创办了广东水陆师学堂,为广东培养和储备了大批军事和科技人才。张之洞督粤期间,还创办了两广电报学堂。

在官办的洋务学堂兴办日多的同时,广州民间也开始兴办新式学堂,当中较有影响的有万木草堂和时敏学堂。1891年创设于广州长兴里的万木草堂实际上是康有为为维新变法培养人才和宣传维新理论的基地。当时的学生有陈千秋、梁启超、麦孟华、徐勤等人,后来都成为戊戌变法运动的重要人物。1898年,在康梁维新变法的直接促使下,教育名流邓家仁和邓家让兄弟共同在西关创办了一所民办新式学校,取名时敏学堂,寓意敏于时务。

晚清的广州教育在不做科举附庸的经史研究和建立新式学校方面都居于全国领先的地位,改变了过去岭南教育的落后状态。

二、现代学校系统的建立与广州的教育改革

跟全国各地的情况一样,虽然广州在晚清出现了一些新式学校,但它们的开办往往是思想开放的地方官员自己决定的,所以这些新式学校零散、不成系统。当时正统的教育机构仍然是省级、府级和州县级书院。这是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另外,尽管传统的府学、州学、县学不再教学,但这些官办学校、它们的教师和学生继续存在,按时举行“岁试”和“科试”,是科举考试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科举考试制度的种种弊端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建立一个新式学校系统以取代传统的书院和官学已是势在必行。

在1898年的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发布的兴学谕明确规定,将各省、府、州、县的书院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堂,以省会的大书院为高等学堂,郡城的书院为中等学堂,州、县之书院为小学堂。这个谕令虽然因为维新运动的失败而未能推行,但教育改革的思想已经开始流行。到1900年庚子之乱,连政府里原来的保守派都认识到再不改革不行了。1901年,清政府下诏书重申“戊戌变法”时的做法,将各省省会的大书院改成高等学堂,各府的书院改成中等学堂,各州、县的书院改成小学堂。中国的传统教育一向只分为“小学”和“大学”两级。1901年由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和小学组成的三级教育系统就是从外国学来的现代学校系统。朝廷规定这些新式学堂一律兼教中学和西学,即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的现代文化。这就是中国建立全国性现代学校系统的开端,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从此广州教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按照朝廷的命令,广雅书院改为两广大学堂,分设文理两科。1903年,两广大学堂改名为两广高等学堂,预科五年、本科三年。1906年,两广高等学堂停招广西省学生,改称为广东省高等学堂,并增设附中。广州的其他书院也大多在几年内停办或改为学堂。新式学堂迅速兴起。如羊城书院和越华书院停办,筹设广州府立中学堂;粤秀书院

改为两广方言学堂；禺山书院改为番禺初级师范学堂；应元书院与菊坡精舍合并改为广东存古学堂等。除官办书院改制外，衙署、学宫和试院也纷纷改建学堂。如1904年，旧贡院开办两广速成师范馆，后又改名两广优级师范学堂。另外，政府还开办了广东将弁学堂和广东陆军小学堂等一批新式军事学堂。同时，广州私立中小学堂也纷纷兴办，如河南有育才书社、南武公学和岭南学堂，西关也办起了进取、南强、述善三所学堂，越秀则有群益、广益、宏育、广育、广才、启明等学堂，还有范阳、德育和洁芳等女子学堂也纷纷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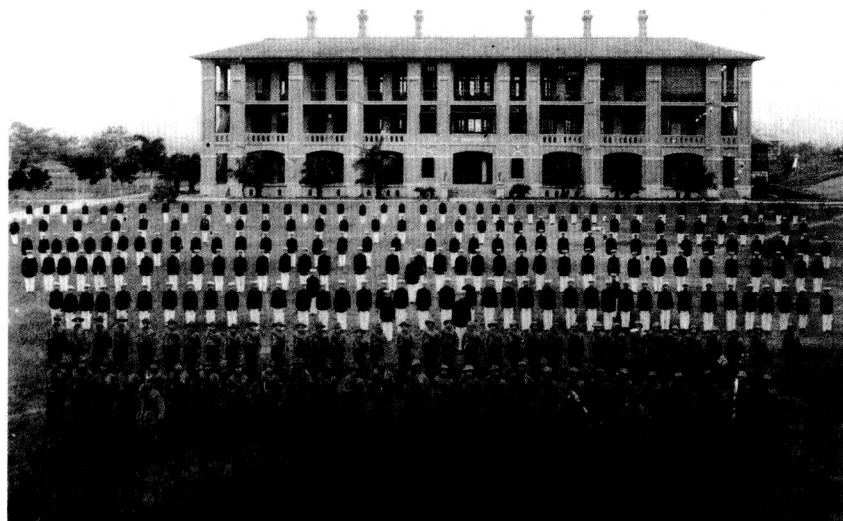
虽然当时建立了现代学校系统，但1901年以后全国的教育还是一个过渡时期，可以说实行的是“双轨制”。传统的府学、州学、县学虽然早就不再教书，却仍然存在，还有专门的经费维持着这个传统学校系统。科举考生依然可以通过“童试”之后获得“秀才”资格，理论上成为府学、州学、县学的学生。而1901年以后建立的官办新式学堂的学生也同样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在正式废除科举之前，士人还是普遍以通过科举为荣。许多人身在新式学校，心还是在科举。

1905年朝廷下令废除科举，也废除了传统的府学、州学、县学，切断了传统读书人的仕进之途，因此，广州地区的新式学堂蓬勃发展，出现了农林讲习所、广东军医学堂、光华医社和广东公立医科专门学校等官私学堂。尽管新式学堂逐渐取代了传统学校，但废科举并没有使儒学失去正统地位。晚清发展现代教育的《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都有保证儒学统治地位的详细规定。朝廷废除科举的命令又重申上述制度，要求新式学校“以修身读经为本”。当时灌输儒家思想的“读经讲经”和“修身”课程在初等小学占总课时的47%，在高等小学占总课时的39%，在中学堂占总课时的28%。为了让学生学好中文，以便读经，朝廷甚至明确规定，初等小学和高等小学不得开设外语课程：“初等、高等小学堂，以养成国民忠国家、尊圣教之心为主……一概毋庸另习洋文，以免抛荒中学根柢。”清政府把儒家思想称为“圣教”，即神圣不可怀疑的学说。废科举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但这并不是一次彻底的改革，因为儒学在清朝灭亡之前一直是朝廷唯一的正统思想。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对教育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首先，蔡元培宣布“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使儒学失去了法定的正统地位。教育部根据临时教育会议的决定公布了民国教育宗旨，即“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这一教育宗旨的提出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其次，民国政府在1912年9月公布了《学校系统》，以后，又陆续颁布了各级各类学校法令，到1913年逐步形成了一个新的学制，即“壬子癸丑学制”。根据新的教育宗旨，民国政府对学校的课程设置进行了重大改革，废除了“忠君”和“尊孔读经”的信条，贯彻了自由平等的民主共和精神。

壬子癸丑学制颁布后，广州的各学校都遵照这个学制而进行了改造。在改造的过程中，袁世凯在1915年颁布了《特定教育纲要》，妄改教育宗旨，但广州的教育界公开予以抵制。为实现教育的统一规划和管理，在广东省教育司倡导下，广州的

督学局于1912年6月成立,专管市区内的小学和私塾,而省会内的中等以上学校则直归省级教育机关管理。民国初期,广州是教育部规定的全国五个学区之一,1912年2月遵教育部令将原来的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改称为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1916年,中外教会人士共同创办的岭南学堂升为岭南大学,广东有了第一个综合性大学。进入20年代,广东高等教育得到较大的发展,高校数目剧增。到1924年,广东有12所高等学校,其中国立1所,省立4所,市立2所,私立5所。在20年代以前,除了梅县嘉应大学外,广东的高校都集中在广州,教学研究以文史、政治、医学和农学见长。中学教育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特别是教会中学开始呈现迅猛的发展势头。但初等教育则发展比较缓慢,新式小学数量不足,大量的私塾依然存在。据1923年末统计,广州全市失学的学龄儿童达1.3万多人。社会教育也有所发展,1920年广州第一通俗图书馆在南关石基里设立,推行民众教育。1920年12月,陈独秀应陈炯明之聘来到广州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在任期间,用行政力量提倡平民教育,调整和整顿中等学校,实行男女同校。当时广州很多中小学,乃至专科学校和大学都纷纷办起平民夜校。另外,一些高等学校和“贵族学校”也设立了公费生名额,推动了平民教育的发展。



从清末以来,中国的教育改革一直主要以日本为榜样,许多西方的理论和做法也是通过日本传入中国的。20世纪初清朝颁布的学制模仿日本,民国初年政府推行的学制还是基本沿用日本的模式。随着现代化改革和中外交流的发展,中国教育家越来越多地直接向西方国家,特别是向美国学习,对民初公布的壬子癸丑学制感到不满。1919年,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五届年会决定讨论学制改革问题。1921年7月,广东省的新学制系统研究会在广州成立,成员为省教育会正副会长、全体评议员30人,全省中小学以上校长18人,大学和专门学校毕业曾研究教育者9人,教育行政人员14人,共71人。由全体会员举出初等教育部、中等教育部、大学及专门教育部、师范教育部四部各10人,讨论制定出广东省教育会的新学制提案。

1921年9月,私立执信学校在广州创立,该校校长、学监和几位校董参加了广东省学制提案的制定,因此执信的学级学科编制皆照广东省教育会学制提案,先招齐了小学六个年级和初中三个年级的学生,高中开设大学预科、家政科、师范科三科,成为了全国第一所实行“六三三”分级制的学校。

1921年10月27日至11月7日,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七届年会在广州举行。各省教育会提出了11种改革方案。各地代表认为广东的方案最合理,决议以广东案为基础制订新学制。1922年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八届年会否定了教育部学制会议通过的方案,以广东教育会在上次年会上提出的草案为基础制定了《学制改革案》,于同年11月1日由大总统颁布,这就是1922年新学制(壬戌学制)。新学制规定小学教育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史称“六三三学制”。这一制度主要参考美国的做法,比旧学制更适合学生心理和生理的发展情况,各种规定也更合理,因而它的基本精神一直实行到现在。1922年学制的颁布,是中国现代教育成熟的标志,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进步。这个学制的制订和提出是广东教育界为中国现代教育的改革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

1922年学制正式施行后,广州各中小学开始改编新制,还建立了由学校教育和补习教育所构成的完整职业教育体系。师范教育的种类也增多了,程度得到提高,设置也更为灵活。在改革学制的同时,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还组织了“新学制课程起草委员会”,着手进行课程改革,于1923年6月确定并颁布了《中小学课程标准纲要》。广州地区各中小学均按此施行。新学制还规定高校实行“选科制”、“学分制”,对学校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管理都有较大的影响,广州各高校也据此编制新的课程表。

三、国民政府时期的广州教育

清朝在建立全国性的现代学校系统时,仍然坚持把儒学作为正统思想。但为了进行改革,朝廷允许一些外国的思想理论在教育界传播。在清朝被推翻以后,儒学失去了法定的正统地位。这是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中国社会第一次没有政府强加的官方意识形态。自由民主思想在教育界更加风行,知识分子可以不受束缚地讲授自己的观点,建立自己的学说。总的来说,从1901年起,中国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是越来越开放,越来越自由。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国民党按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模式进行了改组。在各地军阀互相争斗的时候,国民党控制了广州,经过一年左右的战争,统一了广东大部,并在1925年7月成立了国民政府。为了增强力量,统一全国,国民党将教育也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推行党化教育的政策。当局命令广州市教育局和市立学校全体教职员必须入党,各级学校都要开设三民主义之类的课程。北伐以后,这一政策推向全国,中国教育进入了另一个阶段。

1922年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北京清华大学举行代表大会,引起了中国20年代第一次大规模反基督教的浪潮。当时的广东处于孙中山和陈炯明对抗的战火中,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还是一个力量薄弱的政党,无暇他顾,更无力插足教育界,因此1922年全国性的非基督教运动对广东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在军事倥偬、形势动荡的广东,教会学校有比公立学校更合理的课程设置,更高的教学质量,更好的教学环境,更好的毕业生就业机会,这些都吸引了人们的目光。但在1924年国民党势力壮大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国民党通过鼓动当时广州的学潮和颁布立案规程以削弱教会学校的基督教势力,逐步实现了对教会学校的控制。

北伐以后,国民政府迁离广州,广东逐渐成为反对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的据点。从1928年至1936年,国际形势暂时缓和,广东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工农业发展较快,社会比较安定,教育事业大有发展,广州教育发展出现了一个高潮。其时,广州经济有所发展,教育经费比较稳定,加上海外华侨爱国爱乡,纷纷捐款办学,各级公私学校纷纷创立。为给迅速发展的实业提供所需的技术人才和力量,陈济棠采取了增加教育投入、鼓励私人办学、推广义务教育和成人教育、创设高等院校和职业学校等一系列措施。在陈济棠治粤期间,广州在原有的十几所大学和专科学校的基础上,新办了勤勤大学、省立体育专科学校、省立国医学院,并筹办了省立农业专科学校、省立水产专科学校、省立美术专科学校、省立音乐专科学校等,以培养更多的实用型人才,满足社会的需求。另外,教育层次也随着高校数目的扩充而提升。20年代中后期,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等高校已经开始了研究生教育,到1935年,中山大学成立研究院,1937年4月又成立了研究院第一届硕士学位考试委员会,正式对合格研究生授予硕士学位。中小学校在此期间数量和质量也有了显著的提高。同时,由于实行统考和会考,各级公私学校的教学质量都有所提高。1930年广州各中学高中、初中招收新生,统一考试,按成绩分配。1933年暑假,全省第一次举行高中、初中和小学统一毕业考试,不及格者不能毕业。1936年秋,陈济棠下野,广东地区重新纳入国民党中央的控制,学校中党化教育的色彩也大为加浓。但广州各公立学校不但没有发展,反而减少了几间,而私立学校则更明显地向商业化发展。

1937年7月7日,抗战全面爆发,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在广州各学校掀起,抗日先锋队、战地服务团、救国宣传队等组织纷纷成立。但广州教育当局为准备逃亡,停办了各市立小学,不久又停办初中。同年10月,广州遭到日机的狂轰乱炸,省立和私立中小学校纷纷疏散,公立学校多迁往内地,私立学校特别是教会学校则多迁往香港和澳门。广州饱受战争之苦,教育进程也蒙受挫折,经济衰退、民生凋敝使得许多学校无钱维持、学生无力继学。烽火连天,各校损失巨大,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等学校的校舍设备不能带走的图书仪器均遭破坏。虽然有一些学校在艰难困苦中停办,但还是有许多学校的师生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继续学业与研究。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各类学校纷纷关闭。伪政权成立后,开始着手恢复学校,推行奴化教育,但成果不大。大学只有广东大学一所,中学规模最大的是汪伪政权为纪念汉奸曾仲鸣和沈崧的鸣崧学校,另外还



有广大附中等官办中学和中华中学等私立中学。师范学校只有省立女师和市立师范两所，职业学校也只有省立职校等四所。小学虽有100多所，且存在大量私塾，但大多数儿童依然未能入学。

抗战胜利后，伪政权所办的公立学校由省市教育机关接办，疏散内地和港澳的原广州各级公私学校相继迁回。广州开始恢复在战争中受创的教育。但是，由于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既定预算的教育经费也就大大缩水了，因此经费困难成为战后教育恢复的一大障碍。广州教育界顽强地发展教育事业。1946年7月，广州市教育局重新设立。广州市战前有市立小学90余所。1945年恢复了42所，1946年上学期又增加了22所，并且尽量在学校里增加班额。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学校的资源，让更多的儿童上学，很多学校还实施二部制，把学生分成两批轮流上课。1946年下学期，再增加10所小学，1947年更增加了24所。学生数量从1945年的15929人增加到1946年的30796人。1947年上学期，广州共有市立小学98所，超过了战前的数量。

在恢复公立小学的同时，政府还鼓励开办私立小学。对于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合理的私立小学给予奖励。据统计，1945年度第一学期广州市仅有私立小学25所，学生7658人，到了下学期学校数增加到67所，学生也增加到11925人；1946年度第一学期学校数增加到73所，学生有16807人，而第二学期则增加到112所，学生40480人。私立小学不仅在规模上超过了公立小学，而

且发展的速度也比公立小学要快得多，在初等教育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中国古代，童蒙教育一直是官办教育中最薄弱的环节。1901年全国性近代学校系统建立后，初等教育仍然是政府投资最少的教育领域。因此，在广州，传统的童蒙学校——私塾大量存在，成为教育近代化过程中传统教育最后留下的明显遗迹。民国成立后，广州政府一方面用新式学校取代私塾，另一方面对私塾进行改造，开始了私塾小学化的过程。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的破坏，这一过程受挫，私塾数量回升。抗战胜利后，私塾小学化的过程恢复。广州公私立新式小学不断增加，私塾或者关闭，或者改为现代小学。尽管到1949年广州还有私塾，但现代小学在初等教育中已经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传统教育的残余基本上被铲除。

（作者是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教育史研究所所长）